

工业的问题，想到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对此，他都和有关同志作了探讨。在渡口市的讲演，是冶方同志发挥得最好的讲演之一，也是最能代表他的经济观点的讲演之一。冶方同志的理论中心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利润问题。（引自董辅祁文章：《孙冶方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点滴》）在这次讲演中他针对渡口市干部提出的问题，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和利润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作了详尽的阐述，并对《人民日报》社论把利润说成积累，回避利润的提法提出批评。他在讲演中大声疾呼：我们要在划清资本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利润的前提下理直气壮地为国家多创造上缴利润。利润就是利润，积累就是积累，要讲清楚，不要再忌讳了。冶方同志的这些观点引起很大的震动，因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渡口市的考察结束后，冶方同志又应云南同志的邀请到达昆明，紧接着又考察了驰名中外的西双版纳。那时正是徐迟同志的报告文学刚在报上发表不久，我国热带植物研究的开拓者蔡希陶教授和他创造的人工群落轰动了国内外。冶方同志感动极了。他以极大的兴趣访问了蔡希陶教授亲手创建的热带植物研究所，参观了原始的热带雨林和模拟自然植物群落巧妙地培植出来的人工群落。他为西双版纳发现大铁矿而欢欣鼓舞，再远也要去亲自看看；又为热带雨林遭到破坏而痛惜万状，向省委和中央发出呼吁。冶方同志通过一个多月的考察还深深感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科学研究太薄弱了，不仅中央，而且各地都必须建立经济研究所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云南省委负责同志的赞同，于是云南经济研究所就在他的建议下诞生了。

当我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正是我陪同冶方同志从云南返回成都并送他回北京的五周年的日子。时间虽然过去了五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语言谈吐仍历历在目。一个多月的时间不长，他给我的教育和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理论研究上的彻底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方法将永远指导我前进。

对冶方同志的片断回忆

汤 象 龙

我和冶方同志相识很晚，但我们之间的了解较深，这种了解是通过工作上的多次接触而加深的。他是我敬佩的一位学者，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当他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怀着悲恸的心情在寄去的唁电中说：“孙冶方同志是党的正直无邪、有骨气和群众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他的浩气长存！”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西南地区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的前一天晚上，他是来西南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他一见到我就说：“老汤，我刚到经济研究所的时候，就知道你是搞经济史的。解放前你搜集的大量资料现在仍然保存在经济研究所里！”这两句热情洋溢的话，说明他对我是有了了解的，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是关心的，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感情。我激动地说：“这太好了，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研究。”

在座谈会的第二天谈到科研规划时，我说我仍然从事经济史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近代财政史，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把收藏的十多万件清代抄档资料赶紧组织人力整理

出来,其中许多资料已是半成品,是可以列入规划的。冶方同志十分认真地说:“整理资料工作很重要,会后我们专门开个会,仔细研究一下。”在座谈会第三天的会后,冶方同志特别嘱咐经济研究所的经君健同志邀请有关方面的同志对合作整理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冶方同志表示要将各方面的意见带回北京再研究。他那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我很大的鼓舞。后来只是由于经济研究所未能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在全国规划会议上四川又没有人参加经济史方面的规划,这个意见没能付诸实现。

在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与会的二十几个同志一同游都江堰。冶方同志精神饱满,健步当车,畅游了这一名胜古迹。在二王庙前他紧紧地拉着我的臂膀照相,他风趣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左右的人啦!”我也悄悄地对他讲:“你坐了七年多牢,我被关禁刚好一百天,被迫劳动长达三年,你的精神和身体都还这么好,我得向你学习!”怎么也没想到当国家实现四化还需要他贡献才智的时候,他却离我们而去了。

从都江堰回来的次日,冶方同志到省委党校作报告,地点在四川财经学院学生食堂,财院的师生都参加了。他的讲话是以纯朴的学者风度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表达的,原则性很强,主要讲了他研究的心得,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用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强调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等等。这是他在十年动乱开始时被康生、陈伯达一伙围攻的重大“罪状”,实际上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他襟怀坦白,观点明确,这次讲话深受到会的几千名师生和干部的热烈欢迎。

这位深情的学者在这次报告的次日又专程从城里来财院看我。可太不凑巧,那天我因事不在家,他对我的女儿说:“请你父亲给我写信,去北京时一定要来我那里。”不久,我给他写了表示歉意的信。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我去北京搜集科研资料,在一个晚上我和我的爱人一同去看望冶方同志。谈不到三句,他从书桌抽屉里翻出半年前我给他的信重念了一遍,十分亲切。在这次会见中我们亲切地谈了一些问题。他对整理经济研究所的抄档仍然十分关心,认为这批档案资料不整理是个损失,建议给乔木同志写信谈谈这个问题。我把我和另一位同志合编的《毛泽东关于财政的基本理论》(一本资料性的汇编)请他审阅,他毫不推辞,立即答应十天后给我看完回复。我又把带去的一件拉丁文历史资料请他找一位懂拉丁文的同志翻译一下,这是一九三八年我在伦敦一家古书店买的,是清乾隆皇帝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信。他也热情地满口答应了。我们告别时他一直送我们到我们住处的大门口,他诙谐地说:“我就到此止步了,手中拿着个撮箕,进大门会被误会的?”原来我们离开他家时,他顺手端了一撮箕垃圾倒在楼下垃圾桶里,又送我们走的。这时冶方同志夫妇只住两间房子,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兼会客的地方,挤得满满的,听说当时分给他一套很好的房子,他不要。老夫妇俩的生活完全靠自己劳动,自己料理,孙老说:“我是劳动惯了的,我什么都能做。”

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和我的爱人再去看他。一见面他就说:“你编的东西,内容比较丰富,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央还有的没有公开发表,以后发表了,你那本东西要加以补充。”又说:“我从你编的资料中摘抄了一些,很有用处,省了我不少的工夫。”他还告诉我那篇拉丁文史料已托人翻译去了,有了回信就告诉我。后来这篇资料托北大外文系钱崇树教授译成中文,由李文治同志转交给我了。

以上这些片断只是我和冶方同志在成都和在北京几次平凡的接触。当然,除此以外,我们

还有过多次会晤，这里就不多回忆了。但仅从这几次接触，冶方同志给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如下的深刻印象：

他是一个对共产主义有坚强信念、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深湛造诣、对国家经济建设关心而有独到见解的学者。

他是一个正直无邪、光明磊落、有骨气、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风格的革命家。

他是一个风格高洁，鄙视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和搞家长作风，同时艰苦朴素、不追求个人私利又平易近人和关心同志的领导干部。

总之，冶方同志的各方面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

去“孙寓”拜师

林 圃

自从一九七八年在邛海之滨偶然遇到孙冶方这位良师之后，孙老就同我结下了亲密的深厚的师生情谊。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以为可以也必须用尊师爱生的程度来衡量，或者作为标志。作为老师，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学生们的尊敬和成才；作为学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老师的爱护和指点。

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得到一位良师是不易的，当然要成为良师更是不易的。一九七八年到首都，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要去挤您的牛奶”——他格格地笑着说“我已经是一头挤不出牛奶的老牛了，不过，欢迎，欢迎，您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不，不行，我马上要出国，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太好，经常要去医院看病。”大概他又发现刚才这段“闭门羹”可能会引起我的误会和失望，又立即改变了口气：“不过，您还是随时都可以来。那张表带来没有？座标画出来没有？”随后，就到三里河寓所去看他老人家。进门，我环视了一下简陋、冷落得使人难以置信的“孙寓”：一间卧室，一间既是书房又是办公室，一共大约只有三十多平方米，书斋的陈设也简陋得令人出奇，除了一张办公桌、几个书架、一对旧沙发、一个烤火炉子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劫后的书刊杂乱地堆放着，可想而知家里无人料理，当时只有义务主动充当的助手，并没有秘书；光线暗淡，四邻嘈杂。这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了给一位蜚声全球的经济学家和功垂史册的老革命家的待遇。（据说，后来在胡乔木同志亲自关怀下，才分了一套新房给他。）

谁能相信就在这个简陋而朴实的寓所里，却生产非常杰出的经济思想——外国所称的“孙冶方理论”或“孙冶方改革方案”。他沏完茶，看我还楞着，就说：“坐下，坐下，怎么不下？”一坐下来，就开始了这次面对面的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倾谈。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了五年多，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这里所记载的，只是使我受益至深的问题。

1、关于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与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问题。

话题是从他即将率领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开始的。我不便问他这次访南的使命，倒是他先开口：“南斯拉夫和苏联是两种不同的模式。有比较，才有鉴别。”然后他说：“……在不少东欧国家，个体经济都占不小的比重。这就涉及到对个体经济的性质的分析，对个体